

## 酷儿理论与政治

# 从左翼到酷异：美国同性恋运动的「酷儿化」<sup>1</sup>

何春蕤

一个幽灵在美国学院——政治左派的最后避难所——里徘徊，  
那就是酷儿理论的幽灵。

---David Horowitz

不管 Horowitz 这个说法中包含了多少对酷儿理论和左翼政治的轻蔑，这段话倒是指出了酷儿现象和左翼之间的某种连结。

酷儿论述学者 Michael Warner 在为名着 *Fear of a Queer Planet* 所撰写的〈导论〉中提到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酷儿政治的国族蕴涵，因为「酷儿国族」(Queer Nation)和新的酷儿行动派所采用的战术和目标，部份可以被视为是在「回应公民身分和国族身分所推动的疏离状态」(xx)。换句话说，面对眼下政治领域中动员群众、分化群众的国族和公民论述，酷儿政略想要串连被主流强权疏离的弱势群体来形成抗拒，而这个串连以及它所架设的抗拒网络必然深入文化社

---

<sup>1</sup> 本文是笔者为「情欲政治」(erotic politics, or, politics of sexuality)所写的「导论三部曲」的第三篇。第一篇是〈性革命：一个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美国百年性史〉，收录于《性 / 别研究的新视野：第一届四性研讨会论文集》，何春蕤编，元尊文化，1997年，33-99页。首先写完的第二篇〈色情与女 / 性能动主体〉发表于《中外文学》第二十五卷第四期，1996年9月，6-37页。本文也是笔者所主持的国科会专题研究计画编号 NSC87-2411-H-008-006 之结案报告。

会的各个角落，「因为此刻性体制的秩序已然深深的根植于多得不计其数的各种社会制度之内，也根植于最寻常最标准的认知故事中，所以酷儿的抗争不仅仅是要得到包容或者得到平等地位而已，而是要彻底的挑战这些制度和叙事」(Warner xiii)。从这个角度来看，酷儿政治不但是反国族论述和公民论述的，更是反社会的，它愈来愈对「国家制度、政治过程、媒体、教育、警察及法律」缺乏信心，它要质疑「社会及文化规范、性别观念、生殖的性、以及家庭」(Smith 280)，甚至「需要透过一些乍看之下不见得太和性特别相关的方式，来考量我们如何抗拒被常态化了的性」(Warner xiv)。

这个对「酷儿政治」的定义说明并没有凸显特别的性身分色彩，更引人注目的反倒是它充满左翼政治的色彩，这代表的是酷儿学者们个人在此刻的政治立场呢？还是这样的酷儿期许有其更为广泛、更为深刻的指涉？Lisa Power 注意到各种社会解放运动自 70 年代以来的两个明显特质：毫不保留的肯定自我(assertiveness)，以及超越认同政治的局限，和其他运动积极连结(Power 3)，而这正是许多学者所描述的「酷儿化」的重要迹象；史家也认为这两个特质与同一历史脉络中其他社会运动（如黑人民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性解放运动<sup>2</sup>）的发展直接相关，彼此启示，互相学习(Hekma et. al. 2)。但是就美国同性恋运动而言，这两个特质倒底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脉

---

<sup>2</sup> 60 年代普遍的性革命现象固然有其突破成规的诉求，但是其思考的基准仍是启蒙以来个人主义式的普同人权，其下假设的仍是普同的主体性，因此追求的是一个建立在普同人性上的情欲自由(cf. Ehrenreich et. al.)，它的肯定自我是狭义的个人自我，因而在认同上也比较没有思考和其他群体的关系。这和 90 年代酷儿运动有很大的不同。酷儿运动的兴起在这几方面都有更广泛的定位，在抗争的策略上也尝试摆脱空泛的个人自由而指向社会资源的分配和分享。

络中形成运动的酷儿化的历史征兆？本文将显示，美国同性恋运动的「酷儿化」迹象有其特定的历史进程，而且早在 1950 年代就已浮现；不但如此，「酷儿化」的这两个特质确实有其深刻的激进政治脉络。明确的说，我将显示同性恋运动中「酷儿化」的趋势和美国左翼思潮之间的密切关系。

### 公开的秘密——同性恋与共产党<sup>3</sup>

在所有的西方同性恋历史叙述中，1950 年代美国参议员麦卡锡 (Joseph McCarthy) 等人利用逐渐形成的恐共心理，组成「众议院反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对政治异议份子和同性恋大加迫害，这个史实是耳熟能详的。但是这一连串的政治迫害为什么会把同性恋也视为迫害对象倒是值得思考的问题。难道同性恋和政治异议在那个历史时刻有什么特殊关连吗？这样的关连又会在同性恋运动的形体和发展上形成何种建构？

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指出，美国在二次大战中的广泛投入，迫使它在内政方面采取许多突破原有社会成见的政策和做法，例如女性与黑人都首度获得机会积极参与劳动生产的行列，也拓展了他们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参与，性别秩序和种族秩序因而出现重大调整。1945 年战争虽然结束，战后许多地区的快速赤化（包括中国）以及苏联在东欧的扩张，都令美国忧心忡忡，国家安全与社会秩序窜升为美国国内的首要考量。学者指出，在这种紧缩的氛围中，同性恋凝聚了性别和国族汇集时的动力，被视为扰乱了社会的性别秩序，

---

<sup>3</sup> 1950 年代美国政治高压气氛之下，性与政治、同性恋与共产党经常同时成为个人生命中不可言说的秘密，也因而常常成为沈默的空白。参见 Jacquelyn Dowd Hall, "Open Secrets: Memory, Imagination and the Refashioning of Southern Identity," *American Quarterly* 50.1 (March 1998): 109-124。

而且在政治象征的层面上标记了国力（男性力量）的弱化(Adam 60-62)，因此成为战后美国国族营造工程中亟需被扫除的重要目标。政府的说词则是说同性恋者道德感薄弱（也就是说，个人的性道德可以直接扩大为其一般道德状态），而且容易因其不名誉的性行为而被有心人勒索，可能因此泄露国家机密，是国家安全上的风险(security risk)，因此必须去职(Adam 62; Duberman 183)。事实上，一切「腐败的、堕落的、动摇常规的」行为（包括同性恋和色情）都在当时成为政府关注的目标(D'Emilio & Freedman 282)。统计数字显示，1947 到 1950 年间军队和政府单位中开除了将近五千名疑似同性恋身分的员工(Faderman, *Odd Girls* 140)。同时，在美国介入韩战的关键时刻，联邦政府也决定设立「忠诚委员会」来调查联邦雇员与所谓「颠覆份子」之间的来往关系；这些关系可能包括与共党份子的来往、阅读反美杂志与书籍、支持 1948 年左派总统候选人 Henry Wallace 的进步党、甚至在日常生活中对黑人友善、或者奇装异服，都成为值得监控的对象(Adam 61)，稍后麦卡锡的白色恐怖运作模式就建立在这些具体措施之上。艾森豪总统并且在白色恐怖高峰期的 1953 年下令，以后政府的雇佣程序必须查明申请者的性偏好取向(D'Emilio & Freedman 293)，风气所至，连对同性恋表达友善态度的学术研究也难逃一劫，1954 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在获悉金赛的性研究中心遭受思想调查之后，就立刻终止了对金赛的经费补助(Segal, *Straight* 88)。政治氛围的紧缩加剧社会大众的不安心理，造成对同性恋更为不利的社会环境。

这个历史叙述凸显的是，同性恋者在白色恐怖中被当成整肃排挤的对象，是出于右派政权的阴谋罗织，同性恋是政治高压之下的无辜受害者。当然，这种描绘或许可以为同性恋的不平境遇赢得同情和支持，但是它同时也倾向于以简单的「压力反弹」模式来解释

同性恋运动在 1950 年代之后的蓬勃发展，因而抹去了同性恋运动形成过程中的另一些复杂面向，将性倾向从与其他社会因素之纠葛中孤立出来。本文则将指出，1950 年代同性恋认同的「组织化」和「运动化」，和当时比较激进的同性恋者本身的左翼政治异议立场——而不仅止于他们的性身分认同——紧密相连。事实上，以最明确的例子来说，1951 年在洛杉矶首创成立同性恋地下组织 *The Mattachine*<sup>4</sup> 以推动同性恋自我意识和认同的五位同性恋者，之所以能有此突破——不但开始认识到同性恋议题可以作为激进的社会运动的议题之一，也意识到同性恋身分有可能作为动员异议的轴线——其中很重要的启发来自于这五位同性恋者本身作为（当时受到严厉政治迫害的）共产党员的身分，以及这个身分在当时氛围中所蕴涵的政治压迫。另外，他们推动同性恋认同时所展现的组织能力和战斗构想，则大量得力于他们在之前左翼政治异议抗争经验中的累积。换句话说，美国同性恋运动的形塑运作，和早期成员的激进政治异议身分紧密相连，这对后来性认同运动的渐次动员发展也有深刻的影响。<sup>5</sup>

这当然不是说性倾向认同和某种左翼的政治立场有本质上的正

---

<sup>4</sup> 在 *The Mattachine*（1953 年改组后正名为 *Mattachine Society*，参见 Teal 28）出现之前当然也有其他类似组织，只是后来没有进一步的发展。例如纽约和洛杉矶的 *Veterans Benevolent Association* 就曾经在 1947 年私下印行内部流通的 *Vice Versa* 刊物，以延续战争动员期间建立的同性恋人际关系网络 (Adam 67)。*Mattachine Society* 的前身 *International Fraternal Orders for Peace and Social Dignity*（又称 *Bachelors Anonymous*，名称可能来自同性恋组成的 *Bachelors for Wallace* 助选团体）在 1950 年也宣称是一个「服务和福利的组织，致力保护并促进社会中雌雄同体的少数人」（Thorstad 339）。

<sup>5</sup> 这段历史的研究因为性质特殊，而且十分敏感，其实在大部分史家的写作中都是简略的带过，只有深具左翼立场的 John D'Emilio 做了比较完整的资料收集。

向相关性。事实上，当时受到史达林思想影响的美国共党组织以及大部分毛派团体对同性恋并不友善<sup>6</sup>。教条的左翼立场一向认为同性恋是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妄想用个人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只会引致失志与挫败(Thorstad 323)，在这种党内教条高压之下，左翼的同性恋者在党内并未出柜。以创建 **The Mattachine** 的灵魂人物 **Henry Hay** 为例，他早年加入激进剧团，在罢工和示威抗议的场合中以深具政治性的戏剧表演来激动人心，1934 年 **Hay** 加入美国共产党，但是当时的共产党对所谓「性偏差」(同性恋)也采取和一般人一样的谴责态度，因此 **Hay** 一直没有想过可以融汇他的性身分与政治身分，也就是在他的政治活动中加入性身分的抗争，而在他的性身分意识中加入左翼的视野，1938 年 **Hay** 和一位女性党员结婚，开始他长达 14 年回避性身分出柜的生涯(D'Emilio 19-20)。这种暗柜状态一直要等到 1948 年共产党推出 **Henry Wallace** 竞选美国总统以对抗杜鲁门政权的冷战政策时，才在新的动员活动中掀起性认同出柜的契机。

激进政治的动员活动常常带出新的人际接触与合作，因而开启新的视野眼界；美国的同性恋性认同就正是在左翼政治激化震荡的氛围中出线的。1948 年 8 月 **Hay** 参加一个进步人士的小派对时无意间发现在场人士竟然都是同性恋，当谈话题目飘向当时 **Wallace** 的竞选活动时，**Hay** 和身边的几个人就半开玩笑的开始设计如何在

---

<sup>6</sup> 1917 年俄国革命之后本来设立了一些非常进步的、开明的政策，在婚姻、性、教育上都有前所未有的突破性新措施，因此二零年代就已经形成共识，不让国家的权力涉入私人生活领域，而边缘情欲如肛交、同性恋等也都不再被视为罪行。可惜，史达林建立他的独裁政权后全面扫荡异己，1934 年同性恋再度成为罪行，1944 年堕胎重新被视为非法，连离婚都有可能要罚鍰(Adam 50-52)。风气所至，其他各国的左翼组织也都展现类似的紧缩。

Wallace 的政见中加入性隐私权的条款，以便动员更多非共产党的同性恋者支持 Wallace 的竞选(D'Emilio 20; Teal 27)。这个在无意中因玩笑交心而浮现的小团体（戏称为 **Bachelors-for-Wallace**）后来并未具体发展，但是在广泛发掘更多进步政治潜力的长远目标下，左翼人士首度在概念上由「激进政治身分」的框架出发，来思考「边缘性身分」的可能浮现与运作，因而使得性认同首度戴上运动的意义内涵，被视为有可能发展成为组织同性恋者以推动有关同性恋政治议题的社会因素。不久之后 Hay 透过在左翼的「人民教育中心」教音乐的工作而结识了 Chuck Rowland 和 Bob Hull，发现三人不但同为同性恋，更同为共产党员，后来又认识了激进社会意识舞蹈家 Rudi Gernreich 以及为二次大战日裔美国人权益而战的 Dale Jennings，这五个在政治和性身分上都是双重的「同志」<sup>7</sup>而且同有大量运动组织经验的人，因工作和兴趣相似而经常碰面，终于在 1950 年秋天的一个午后成立秘密结社 **The Mattachine**。

这个地下结社从每个角度来看都是个忠于左翼传统的组织<sup>8</sup>，不但有阶层严谨的权力结构，而且积极援引左派的社会分析，把同性恋视为「受压迫的文化少数」，认为一定要透过同性恋本身的集体行动才可能改变社会结构中对同性恋的排挤迫害(D'Emilio 23-24; Weeks 197)。在具体组织方面，这个小团体也遵循着左翼发展组织

---

<sup>7</sup> 本文将以加了引号的「同志」来指涉左翼政治认同和同性恋认同在个别主体身上的合一。

<sup>8</sup> 创始的五位成员都有丰富的受迫害及抗争经验，如 Hay 的激进剧场经验；Rowland 在美国退伍军人委员会工作时就遭受反共检验；Jennings 曾为加州的日裔权益而努力；Gernreich 逃离了奥地利以避免纳粹对犹太人和左派的迫害(D'Emilio 24)。这些激进的政治抗争经验与他们个人长年隐藏的同性恋身分，共同塑造了他们认识迫害的角度。

的模式，以在众多地区渐次发展读书讨论小组来吸引其他「同志」加入。另外，左翼的渊源也使得 **Mattachine** 从一开始就认定应该与劳工组织和其他少数族群密切合作，**Hay** 在成立前花了两年时间写成的成立宗旨就认为应该积极抗拒美国法西斯的倾向，而且要和别的社群合作，争取全世界所有少数民族（包括同性恋）的自由(**Teal 27**)。这种把同性恋视为「少数族群」之一而且和更广大的弱势社群同命的看法，在性身分尚未公开出柜、尚在孤立隐讳中挣扎的历史时刻出现，实在是左翼思考的一大延伸。

左翼的思想和实践渊源更进一步使得这个日渐扩大的秘密组织在遭逢具体迫害时，选择采取与公权力对抗的政治行动，因而渐次塑造了新兴同性恋运动的激进气势。1952年2月，由于 **Jennings** 落入洛杉矶警方预布的陷阱被捕并将被起诉，**Mattachine** 的核心「同志」们一方面透过 **Hay** 的共产党关系延请著名的激进律师 **George Shibley** 前来为 **Jennings** 辩护(**D'Emilio 31**)，另一方面计画动员群众形成集体行动去支援 **Jennings**。可是大部分讨论小组的一般成员在面对法律时还是拥抱「唯法律是从」的主流观念，认为 **Jennings** 若是被捕就一定是真的有罪<sup>9</sup>，因此抗争的动机很低，核心「同志」于是采行共产党一贯的抗争策略，组成一个「禁止诱陷公民委员会」(**Citizens Committee to Outlaw Entrapment**)，借着亲手派发的文宣传传单来诉求广大群众的关切。也正是在这些挑战警察权威的文宣传单中，左派同性恋首度以性倾向为基点，发展了「单刀直入、说服力

---

<sup>9</sup> 这种缺乏行动力的表现可能需要历史原因来解释。毕竟，「50年代早期尚无任何大型的示威行动以支持个人对现状的挑战，也没有什么广受人注意的次文化来合理化另类的生活方式；相反的，整个同性恋次文化中都弥漫着一股不安的、脆弱的气氛」(**D'Emilio 29**)。



十足」公开论辩语言，来向群众说明，「诱陷」会对所有人——而不是只有同性恋——的人身自由造成威胁(D'Emilio 32-33)。

在这个深具突破性的公开论述行动中已经可以看到 *Mattachine* 的运作性质明显超越了过去各种同性爱(homophile)组织以联谊为主的活动层次以及屈意迎合以融入主流的低调态度(Faderman, *Odd Girls* 190)。因为，即使在高度紧张的麦卡锡白色恐怖年代中，以共产党「同志」为主的同性恋运动仍然从它左翼的传承中吸收了毫不妥协的挑战态度和深刻的结构分析，以强势的文宣凸显性身分，进行积极抗争。此外，在论述策略上，*Mattachine* 虽然从性身分出发，却没有画地自限，而是以公民权(civil rights)的伸张来串连同性恋与其他主体共享的抗争位置，企图动员更大更广的不满和参与。在 1950 年代政治高压中就已经出现的这种抗争态度和自我定位，不但明确标志了 *Mattachine* 初期的左翼色彩和立场，也为其后的激进社会运动提供无限启发。

「禁止诱陷公民委员会」的强势论述抗争策略后来证明是成功的。1952 年 6 月陪审团最终无法定讞，检察官也在重审之前撤销告诉，Jennings 的案子因此成了同性恋地下组织发展的转捩点。官司之后，军心大振的核心「同志」决定着手成立另外一个以教育社会为宗旨的公开组织 *Mattachine Foundation*，以基金会的正当形式来中介并扩大地下组织的影响力，第一本公开发行的同性恋杂志 *ONE* 于 1953 年元月开始发行，同时同性恋者大批加入 *Mattachine* 在各地的讨论小组，会员人数暴增，到 1953 年 5 月时，已增至两千人，遍布各大城市，而随着人数增加，小组活动也开始多样化，除了讨论之外，由专业学者组成的讨论小组也开始着手研究同性恋在文化各层

面中的存在，以增加同性恋的正当性(D'Emilio 35-36)。<sup>10</sup>

组织扩展和建立门面的措施固然使得 **Mattachine** 在吸引新人和推动各种计画的过程中得以避开因为组织本身过度秘密所带来的可疑形象，但是面对组织要开放到什么地步的问题，面对「公开」和「秘密」之间的抉择，「同志」们却有不同的局势评估。虽然同为激进的共产党同志，**Rowland** 和 **Hull** 等人倾向进一步扩大地上组织，他们觉得 **Mattachine** 已经在三年中创造了足够的友善氛围，左翼「同志」应该在这个扩张的时刻主导重组 **Mattachine**，以便更加开放会员的招募并维持左翼的领导地位。创立元老 **Hay** 则对广开大门多所疑惧，因为他认为当时热切加入的新入会者只是赶热潮，只是想在一己触法时得以借组织的支援脱身，而并没有意愿投入支持一个长期奋战而且激进左翼的同性恋运动(D'Emilio 38)。这个内部意见的差异还没有得到充分讨论，逐渐达到高峰的白色恐怖氛围很快就紧缩了核心「同志」挥洒左翼政略的空间。

这个紧缩的动作在某个方面来说是右派人士对 **Mattachine** 当时开始采取的激进策略所做的回应。左翼的核心「同志」在 1952 年底 **Jennings** 案之后组织蓬勃成长的大好前景中，继续采取积极的政治策略以提升同性恋议题的可见度，甚至企图把它带入即将进行的地方选举中。他们发信给当时洛杉矶教育委员会的候选人，指出公立

---

<sup>10</sup> **Mattachine** 过度快速的成长也使得组织的运作倍受压力，讨论小组的领导阶层往往缺乏足够认知和调教就披挂上场，使得组织的共识和向心力日渐单薄；同时，核心成员 **Hay** 和 **Rowland** 也开始辩论是否要重组 **Mattachine** 成为一个开放的地上组织，还是维持某种封闭性和纯净性(D'Emilio 37-38)。不过，在核心成员尚未达成共识之前，1953 年的 **Mattachine** 大会就已经改弦更张，把左翼的成员全部赶出了领导阶层（下详）。

学校的教育为同性恋青少年学子制造了许多压力和悲剧，并要求教育委员候选人表达立场，承诺当选后在辅导疑似同性恋学生时会采取中立的立场；同时他们也发信给市长候选人和市议员候选人，提醒他们注意洛杉矶市警察单位一贯对同性恋者所采取的诸多非法处置 (D'Emilio 36)。这些积极的战略把 **Mattachine** 这个同性恋组织推上了正面与权力结构角力的位置，不但在概念上，更在政治诉求上，正式结合了性身分与政治策略，是左翼同性恋政略的明确出线。

这个强势的作为成功的凸显了同性恋议题，但也吸引了周遭好奇而不怀好意的媒体关注。起初核心「同志」向候选人发出的信件并未得到太多回应，但是组织的快速成长却引起有心人士的关注，1953年初洛杉矶镜报的一位右派专栏记者写了一篇文章，以舆论为名向 **Mattachine** 的一般成员提出挑拨，以迫使这个同性恋组织（在麦卡锡白色恐怖的时刻！）为自己的政治倾向表态。这篇文章以极为不友善的语调质疑 **Mattachine** 向候选人的游说，指称这是一个「诡异的新压力团体」，没有任何的正式登记，而且其顾问律师 **Fred M. Snider** 在「众议院反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作证时表现得非常不合作。文章因此暗示，同性恋「是被社区蔑视的一群，他们很可能会集结在一起以求自保，最后也可能形成极大的力量」，不过由于同性恋当时被视为「安全风险」，这篇文章因此警告成员小心，因为任何一个训练有素的颠覆份子都有可能轻易的把同性恋组织转化成一个「危险的政治武器」 (D'Emilio 39)。

这篇充满暗示的文章在白色恐怖高峰的 1953 年初出现，也就是当麦卡锡的「众议院反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来到洛杉矶调查共产党的活动时出现，确实有其严重意义。同性恋身分和政治疑虑之间的可能关连，过去只是在政府的政策中以抽象的、含混的语言浮现，

但是此刻在这个敏感时刻，这篇专栏文章描写眼前同性恋身分的具体集结行动极可能是可疑政治活动的掩护，日渐普及而活跃的 **Mattachine** 组织内层层隐讳的运作模式更证实该组织的可疑威胁性。此外，这片疑云也在 **Mattachine** 内部形成巨大冲击，在政治恐慌之下，许多晚期加入的成员强烈要求组织中央明确说明自身的政治立场 (D'Emilio 39)，核心「同志」则在众方压力之下筹划召开大会，预备以民主的方式来决定浮上台面后的组织形态。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是核心的左翼「同志」被要求在政治立场上「出柜」的时刻。讽刺的是，出柜的压力竟然来自那些百般保护自己的暗柜性身分的同志（同性恋）。公开抑或秘密、左翼抑或保守、此柜抑或彼柜的决战因此爆发。1953年4月11-12日，**Mattachine** 在洛杉矶普同教会召开第一次会员大会，风雨欲来的紧张气氛使得核心「同志」深深感受到政治立场出柜的压力。虽然核心「同志」已经宣布不寻求在新的领导架构中任职，一向主张组织地上化的 **Rowland** 仍然在会前发表声明：「不管什么结局，我们都反对任何以 **Mattachine** 为名的组织发表任何非共产主义立场的声明。如果一个组织以宣示效忠国家为入会的条件，作为个人，我们坚决拒绝和这个组织发生任何关联。我们的立场是，和『众议院反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正面抗争，是我们的圣战，是符合我们利益的」(D'Emilio 40)。**Rowland** 的坚持，表达了核心「同志」对左翼政治信念和边缘性身分之间历史性连结的执着态度。由于 **Mattachine** 的活动力和积极抗争主要建立在核心「同志」出自左翼立场的结构分析和抗争经验之上，虽然面对周遭压力要求左翼「同志」在政治高压氛围中冒险「出柜」（左翼政治立场的暗柜）以转移外界对同性恋身分的政治猜忌，核心「同志」仍然表明他们希望 **Mattachine** 继续结合同志身分和左翼政治异议的殷切盼望。

可惜会议的结果并不如核心「同志」的期望。出席大会的人数大约是一百人左右，男女都有，对他们而言，这是有史以来同性恋的第一次集体出柜——而且可以是边缘性身分和左翼异议政治立场的同时出柜；然而在这个白色恐怖的历史时刻，把这两个身分之间的关连切断，抹去这两个身分之间的相互启发和培力历史，却已经成为许多成员的共识。创会的核心「同志」在 1953 年 4 月第一次的会期中似乎成功的缓和了各方压力，但是在 5 月的会期中，新的领导人物 **Kenneth Burns**、**Marilyn Rieger**、**Hal Call** 成功出线，用当时大家耳熟能详的反共教条语言在左翼的「同志」身上投下可疑的阴影，以此把后者拉下领导位置；**Call** 并且公开要求在组织章程中加上「反对可疑政治立场」的条款，因为「我们已经被外界当成共产党来攻击了」，这个新的条款据说将可保障组织「不受共产党的渗透」，并保障同性恋不必承受眼前的政治猜忌(D'Emilio 44-45)。这个提案虽然最后并未通过，但是恐共的气氛已经非常明显。新当选的领导班底成立了以反共为基调的「协调会」(Coordinating Council) 作为决策中心，采取低调的、融入主流的组织 and 活动策略(Adam 69)，同时维持对会内共产党份子一定程度的「关切」。据说立法委员会的主席 **David Finn** 甚至在 1953 年 5 月大会后两星期就已经把 **Mattachine** 的宪章交给了联邦调查局备查，并向该局说明了他自己和其他的成员是如何努力的在组织内「清共」(D'Emilio 48)。此外，洛杉矶和旧金山的「协调会」竟然干犯大会决议，单方面的以组织名义发布文宣，宣布 **Mattachine** 为一个「坚决反共」的组织，并且强调「同性恋…不会试图推翻或破坏社会既存的制度、法律、道德，而是要融入社会，做建设性的、有价值的、负责任的公民」(D'Emilio 48)。这个政治立场的宣示在 1953 年的白色恐怖氛围中或许保住了同性恋组织的存续，但是这个高度局限的存活状态也立刻江河日下的重新塑

造了 **Mattachine** 的性质和方向。到 1953 年 11 月时，新的领导班底已经成功的扫除了创会「同志」所留下的影响和风格<sup>11</sup>，把组织更名为 **Mattachine Society**(Teal 28)，而且把工作目标限制为联谊活动，在主流化的趋势中锁定吸收那些已经有社会身分和影响力的人(D'Emilio 49)，组织的机动性和激进性都有明显的削减。没有马派的理论基础、没有社会分析、没有策略讨论，「他们以为只要除去偏见就可以改变这个社会对待同性恋的方式」(D'Emilio 27)。

这次换血大行动当然也激化了另外一些成员的回应。一个月之内，大批的组织工作人员及会员因为认同核心「同志」的政治理念而相继辞去职位，到了 9 月，北加州甚至有大批会员退出了组织，因为他们觉得那些「想搞运动的人」和那些只想「被社会尊重的人」之间的鸿沟愈来愈深(D'Emilio 50)。不管如何，不一样的组织色彩当然会吸引不一样的主体加入组织，也会排挤另一些主体与组织保持距离；**Mattachine** 的换血行动清掉了早期左翼「同志」的异象和方向，柔化了激进运动的冲力和活力，但是也把未来同性恋运动的发展契机留给了更边缘的「同志」<sup>12</sup>。

**Mattachine Society** 的历史转折显示，1950 年代个别同性恋者在一定的集体历史脉络中的政治及社会涉入，使他们得以援引其激进化、政治化的模式和资源，在新的集结意义中形塑并浮现自身的性

---

<sup>11</sup> 这次的「清党」对创会元老而言，不但是组织上的挫败，更是人生的重大打击，Hull 后来自杀身亡，Jennings 彻底退出运动，Rowland 酗酒以终，只有 Hay 持续活动，终究在 1970 年代的同性恋解放运动中看到理想的再生(D'Emilio 54-55)。

<sup>12</sup> 女同性恋则在 1955 年组成了 Daughters of Bilitis 的联谊组织，但是在类似的氛围中，这两个团体的性质都有颇为明显的阶级倾向。

认同。但是，作为一个座落在具体脉络中的社会意义轴线，这个新近浮现的性认同也必然同时会受到脉络中其他社会力的折射渗透而多样化 / 分歧化，至于这个多样化 / 分歧化会以何种面貌和操作出现，会不会倾向于多元民主式的联盟合作，还是寻求单一正统形象的纯净化，那就是一个历史的问题了。在 1950 年代政治氛围的激化中，性认同的某种程度的出柜，选择了以排除左翼成份和左翼路线来呈现自我以赢得正当性；Mattachine 创会「同志」所遭受的「政治身分出柜 / 性认同身分出局」就是这个同性恋身分「纯净化以便主流化」过程的标志。

Mattachine Society 或许希望在自身的形象中清除早期进步「同志」的痕迹，但是同时遭到压抑的却是早期「同志」所开创的论述资源和新的抗争气魄：结构分析、积极抗争、自我骄傲、集体行动、串连结盟——这些标明一个活跃激进的社会运动的记号，终究在下一阶段的左翼运动中再度开花结果，促成美国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再度蓬勃。

### 性身分的激进化：同性恋与新左派

美国同性恋运动史上公认的两个重要转折事实上都和左翼运动的发展相关。1950 年代初在麦卡锡白色恐怖之下，左翼「同志」在政治高压中发现了性身分的可能运动蕴涵，因而开创了新一代的同性恋激进政略，以正面挑战体制的方式来巩固性身分的自信内涵。但是逐步发展左翼结构分析和激进同性恋政略的 Mattachine Society 在日渐尖锐化的政治污名压力下最后选择了「清共」，用放逐激进政治身分来换取边缘性身分的苟且存活，并以温和的融合路线取代原本肯定自我争取权利的运动策略。政治高压之下，连 1955 年第一个女同性恋联谊组织 Daughters of Bilitis (DOB) 成立时都非常谨慎的维

持极小的规模和高度的隐密，甚至她们的出版品 *The Ladder* 也明白的宣示，组织的目标只是向女同性恋「推广一种可以被社会接受的行为和衣着模式」，并且渐进的教育异性恋大众：同性恋也是好公民；她们相信过分宣扬自己的性身分不但有可能为个人带来危险，也会影响中产阶级女同性恋融入主流社会的机会(Faderman, *Odd Girls* 180)。然而早年左翼「同志」所示范的自信和抗争传统已经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随着麦卡锡主义退潮，Mattachine 也渐渐开始采用比较积极的方式抗议警察暴力(Power 2)，1958 年同性恋杂志 *One* 甚至在封面上刊登了充满自信的宣示：「我真高兴我是同性恋」(Teal 24)，表达出一种逐渐浮现的自我肯定，后来虽然有许多订户感觉不安而退订，但是这个高亢的宣告已经预示了下一阶段同性恋运动的基调。1960 年代末期，深受新左思潮滋养的「同性恋解放阵线」(Gay Liberation Front)正式的向同性恋主流组织提出挑战，并掀起同性恋颂扬自我、培力壮大的抗争潮流，重新把左翼引入同性恋运动，形成下一阶段运动的重生。

左翼思潮之再度冲击同性恋运动，伴随了另一些新兴社会运动的发展，也因为这些启发而调教出一整个世代有崭新运动理念和抗争气质的同性恋。在发展主体性方面，麦卡锡主义开始松动它的恐怖统治没有多久，由金恩等人所带领的黑人民权运动便已兴起，民权运动向早先 1950 年代全球反帝、反殖运动中学习了由左翼发展出来提升人民自觉的群体活动<sup>13</sup>，透过每一个主体的自我描述和反省，来提升集体受压迫的意识和抗争动机(Echols 83-84)。这样一个壮大

---

<sup>13</sup> 这种所谓 Consciousness-raising 的群体交心活动包括中共在农民中推动的「忆苦思甜」，美国南方黑人解放运动所推广的「细诉真相」(tell it like it is) 等，瓜地马拉的革命游击队也使用过类似策略来提升群众意识。



个别主体以形成群体凝聚力的实践，使得原本被压迫的黑人主体得以透过论述和身体的改造过程而产生新的力量，也为培力壮大其他受压迫的主体提供了典范。在进行直接行动方面，印度精神领袖甘地所启发的非暴力理念，以及左翼工人运动长久以来发展的集体抗争传统，在此时提供了具体的实践资源，让民权运动从 1960 年代初期开始，就用静坐、游行、示威、搅扰黑白区隔等所谓「直接行动」(direct action)<sup>14</sup>，坚定的要求分享公民的各种权利(Adam 75)。民权运动所累积的运作方式和抗争模式也因而成为下一阶段美国各种社会运动的原型。另外，在发展群体的权利论述方面，黑人民权运动及第二波的妇女解放运动开创了受压迫群体起而抗争争取权利的典范，以新的正义论述把弱势族群建构为权利被无理剥削的少数民族，也启发了种族性别轴线之外的其他弱势族群（如同性恋）建构自身为另一个少数民族、另一个弱势群体，在正义原则之下要求主流分享权利，并援用别的运动已经发展出来的论述和抗争资源来建构自己的解放运动(D'Emilio & Freedman 320)<sup>15</sup>。美国国内的政治和种族

---

<sup>14</sup> 19 世纪由左派带动的劳动阶级运动已经使用了某些「直接行动」策略来具象诉求，除了这个历史传承之外，1960 年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金恩引申了印度精神领袖甘地在寻求殖民地独立时所采用的非暴力抗争策略，鼓励黑人不再以规避、沈默、隐忍来容许白人对种族不平等视而不见，而改以不含武力暴力的静态行动（像静坐、示威、占据白人特定座位等等），踰越 / 凸显种族规范，挑战 / 挑衅当时的族群隔离政策，以强迫统治者面对弱势的存在。其后的各种社会运动都深受这种运动策略的启发，并在「直接行动」的基础上发展出各有不同程度的冲撞策略，其中尤以美国的爱滋组织 Act Up 和英国的 OutRage 最具有争议性，最活跃抗争的同性恋团体 Act Up 就曾积极的研究石墙事件后激进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各项运作，以学习过去的教训和诀窍(Katz xvi)。

<sup>15</sup> 这样的叙述描绘的是个别运动之间的相互模仿，但是它本身也割裂了社会运动之间的互相重迭；毕竟，运动中的个人成员从来就拥有多重身分和

情势愈是对立紧张，社会运动的激进倾向也就更明显，1967 年已有「冲突政治」(confrontational politics)之说，其后两年中，激进运动如黑人国族主义者、嬉皮学生、反战示威者都不断升高政治张力和抗争模式，这些经验后来都渐次透过参与者抗争目标的扩大而移转到性议题和性别议题的抗争上(Adam 82; Altman 58)。

反帝反殖运动中所示范的抗争意识建立在「被压迫」的明显事实上，可是当压迫夹带着原有根深蒂固的道德成见，以污名和歧视作为最深刻的压迫形式时，无法出柜的被污名主体（例如同性恋）的抗争，还需要另外一些突破才可能挣脱那些阻碍主体自豪得力的社会因素。历史学者指出 1950 年代在旧金山北湾和纽约格林威治村发迹的次文化「极乐 / 击垮世代」(Beat Generation)<sup>16</sup>，就以其不见容于主流社会的边缘生活方式（群居、嗑药、酗酒、滥交等）和

---

认同，也常常为了不同的理念和理想而同时加入各种不同的运动抗争。换句话说，1960 年代兴起的各种乐观而强力肯定自我的运动——不管是黑人民权运动或是妇女解放运动或是反战运动——都有无数同性恋在其中，激进社会运动虽然滋养了同性恋的抗争动力，但是同性恋的性身分在这些组织中却是隐讳的、被压抑的，也因此是与各种权益和颂扬隔绝的。1960 年代末期妇女运动因抗议新左派阵营对妇女议题的轻蔑而脱队形成自己的运动，形成第二波妇女运动，以及同一时期同性恋运动自新左派阵营中脱颖而出，凸显自己的诉求和运动理想，这些分裂发展都记录了这个历史发展(Adam 79; Echols 27)。

<sup>16</sup> Beat 意指「耗尽」，但是同时也来自 beatitude，也就是「极乐」。Beat 世代希望在过度腐败、过分看重物质、充满黠武精神的年代中，透过清贫的生活和各种迷幻药、酒精、性实验，在沮丧无力的深渊中达成灵性上的启发和心理的平静。代表人物是在旧金山 City Lights 书店聚集的诗人 Allen Ginsberg、Gregory Corso、Gary Snyder、William Burroughs 等人，他们的作品中对同性恋都有突破常规的肯定和颂扬。

甩成规的强悍态度，示范了反叛精神的具体表现。更令当代同性恋动容的是，「极乐 / 击垮世代」的著名诗人 **Allen Ginsberg** 等人都在他们的诗作中以有力的诗句毫无保留的正面描写同性恋，公开的颂扬同性恋。文化异议份子的这种自豪情操，为情欲异议份子创立了自我肯定和自我夸示的榜样(Adam 74)。除此之外，1960 年代风行的性革命(cf. Ehrenreich et. al.)、嬉皮运动(Faderman, *Odd Girls* 203)、学生反战运动(D'Emilio & Freedman 306-07)等等，都对既有建制采取不信任的、反对的态度，一步步削弱了建制和常规在个人心中内化了的权威力量，显示既有的共识是可以挑战的，可以被推翻的，也就是说污名是强加的，是压迫的象征，这么一来也逐步松动了污名歧视所带来的自惭和羞耻，使自我肯定和自傲有机会得到培养。事实上，「自豪」(pride)正是这个阶段各个边缘社会运动——从黑人解放运动到同性恋解放运动——最重要的凝聚焦点。

研究者也注意到，这些运动之所以能够理直气壮的正面挑战既有的污名和歧视，很大一部份力量来自运动成员的年龄和这个年龄层在当时形成的感情结构。1950 年代开始，被资本主义消费文化逐步构筑出来的年轻自主性愈来愈凸显(Seidman, *Romantic* 125)，并在各种社会运动的动员中形成「反叛有理」的坦然态度，年轻一代甚至对看来怯懦的上一代——虽然只仅仅差了几岁——表示极度的不信任（「别相信三十岁以上的人」是当时年轻人的流行话）。更明显的是，年轻一代的同性恋没有经历五零年代的高压气氛，因此也没有像上一代同性恋那样内化了自我怀疑和自惭退缩(Altman 60; Faderman, "The Big Bang" 19)，即使有不少人对自己的性身分还是觉得多少有些恐惧羞愧，但是已经有愈来愈多的同性恋开始拥抱新找到的自我肯定和骄傲(Altman 56)。有成员就注意到这个代间的差距：「新世代不但接受自己身为同性恋的事实，而且还嚣张的向众人炫

耀，年纪比较大一点的男孩看在眼里，脸上有着紧张的神色，只能关切的低声耳语」(Teal 5)。这种种世代和气势上的发展都在努力维持温和低调的同性爱(homophile)团体中激发新的视野和方向<sup>17</sup>。

以上这个历史叙述固然提供了脉络性的观点，但是它也掩盖了一个重要的事实：1960年代大量衍生而且被统称为「新左派」(New Left)的社会运动逐步形成了新的抗争模式和气势，许多进步人士都积极参与好几个运动，而后来出现的激进行动派同性恋运动份子有很多早就是新左派各个社会运动的成员，他们认同的是左翼的社会变革理念，投入的是各式各样的进步议题，并且在其中学习了强悍的抗争气息以及灵活的抗争策略(Adam 82; Power 2; Teal 35)。这些左翼同性恋是在和同性恋身分直接相关的一些迫害事件中感受到累积起来的社会不满，而既有的同性恋组织及非同性恋运动团体却反应迟钝冷漠时，才集结起来，凸显同性恋身分作为激进抗争的另一个发话位置，形成一个新的运动，但是和其他社会运动之间则因为成员同时拥有的多重身分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换句话说，同性恋认同在这个阶段的浮现和激进化，和当时其他的抗争运动及其左翼源头有着骨肉相连的关系。

流传至今，许多人都把1969年6月27日纽约石墙酒吧在被警方数度恶意临检后发生的暴动事件(The Stonewall Riots)当成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发迹时刻，然而事实上在石墙事件之前就有不少同性恋

---

<sup>17</sup> 1974年就有人注意到，在募款时那些最有能力捐款的律师、医生、专业人士就连匿名或间接捐款的勇气都没有：「一整个世代的同性恋都已经完蛋了——他们已经彻底的、没希望回头的被父权文化洗了脑，变得怯懦了。如果我们的社群要成为现实，准备的工作和日后的报偿都要归于年轻一代了」(Duberman 284)。

组织早已经在澎湃汹涌的各种社会运动潮流中逐步激化(Teal 33)。最明显的例子包括，1962年 Daughter of Bilitis 的出版品 *The Ladder: A Lesbian Review* 改由 Barbara Gittings 担任总编辑，她上任后一改社交联谊的杂志定位，开始用强悍的论述极力挑战「同性恋有病」的说法，使 DOB 愈来愈像一个群众运动。1965年 DOB 的老领导班子感受到周遭的激进形势，在忧心忡忡中将 Gittings 去职，温和路线和激进路线因而发生对决，最后 DOB 的会员们选出有史以来第一位黑人会长，取代原有的领导班子，也表明了选择激进化的路线(Adam 77)。同年 *The Ladder* 刊出的街头抗议实录中也开始浮现一些首度参加公开街头行动以表明抗争立场时的新体验和新情绪：「今天我丢掉了最后一丝恐惧」，「今天我觉得好像心头落下了一块大石」，「今天是我生命中最骄傲的一天」(Teal 24)。旧的自惭和恐惧在激进的运动经验中逐渐退潮，新的自在自豪正在形成。另外，1964年，华盛顿的 Mattachine Society 也在 Franklin Kameny 的领导之下，开始采取正面出击的策略向各个联邦机构公开抗议政府对同性恋的歧视作风(Teal 14)。有别于纽约 Mattachine Society 的温和路线，Kameny 依循着黑人民权运动的口号「黑就是美！」("Black is Beautiful!")，提出「同性恋真棒！」("Gay Is Good")的口号，以高度肯定自我的激进作风为同性恋运动开启另一个契机；影响所至，纽约的 Mattachine Society 在1964年的改选中也决定逐出保守的老一代，改采积极路线(Adam 77)。还有，旧金山的「个人权利协会」(Society for Individual Rights, SIR)从1964年成立时开始，就一直不满主流同性恋运动的停滞缓慢，并自行举办各种社交活动，开设各种服务设施来为同性恋者提供援助(Teal 23)。事实上，到1969年为止，美国各地已经有了十余个颇为活跃激进的同性恋组织为同性恋积极争取民权(Faderman, "The Big Bang" 19; Teal 28)。这些在石墙事件之前浮现的发展都显

示，高亢的自我意识已然逐渐形成 1960 年代年轻一代的基调，这使得新同性恋运动在重新集结时表达出最强悍不驯的抗争风气，也使得它和新左派的抗争路线呈现合流的可能。

如果说 1969 年之前同性恋组织就已经逐步激进化，那么把同性恋运动在石墙事件后的激化发展归因于 6 月 27 日石墙事件点燃导火线，还是有点太过粗略。酒吧临检不是新事，警方暴力相向也曾经发生过，而且石墙事件中暴动的群众多半是颇不为主流社会见容的劳动阶级变装皇后(drag queen)、女同性恋(dykes)、游民、青少年等等，这些一般被认为文化水平不高的人在酒吧外鼓噪挑衅，嘲笑临检的警方或当场做即席的扮装表演，更甚或丢掷铜币、石块、停车码表等(Adam 81; Power 1)，按理说是不会引起太多关注的；后来的发展也显示，连暴动群众本身也并没有在当下形成什么组织。事实上，对大部分的同性恋而言，后来被建构成「石墙暴动」的事件，只是纽约区域报纸上的一个小新闻而已，《纽约时报》的小标题平淡的说：「四名警察在格林威治村的突袭中受伤」，而这类常见的标题根本引不起太多注意(Faderman, "The Big Bang" 17)<sup>18</sup>。

可是终究有一些深受当时左翼思潮影响的人注意到了这个事件，而当既有同性恋组织对这个事件的温和反应无法满足此刻因社

---

<sup>18</sup> 石墙事件并非警方恶意骚扰同性恋的唯一案例，酒吧区内的警方恶意临检是常有的事。即使在酒吧区外，在石墙事件后一星期之内，纽约市同性恋常常流连的一个公园就不断遭到一些激烈的市民纠察队骚扰，这些市民以手电筒和无线电对讲机在公园内制造困扰，被质疑其权威时还说是警方的认可。7 月 2 日，公园中的许多树木在夜间被全数修矮，以扫除公园中的隐密性(Faderman, "The Big Bang" 21; Teal 10-11)。8 月 3 日新近成立的「同性恋解放阵线」和 Mattachine Society 的第二个「行动委员会」这两个团体曾为此事举牌抗议(Adam 85; Teal 36)。

会运动风起云涌而激动澎湃的群众情绪结构时，左翼出身的同性恋运动份子成功的运用新近流行的革命语言，把「石墙」发展成重要的的动员象征：石墙事件中变装皇后们的境遇被延伸成为同性恋的共有处境，石墙暴动也因而标记了同性恋运动行动化、激进化的具体征兆。

前面提过的资深女同性恋运动者 Barbara Gittings 曾经比较过早期同性恋运动和此刻激进同性恋运动之间的差异：「在 1950 年代的运动中，同性恋是向内的，集中于自己和自己的问题上；他们寻求的是包容和理解。在 1960 年代，我们是向外的，我们向自身之外去找寻问题的根源」(Teal 23)。可是在某一个意义上，这两个历史时段同性恋运动内部的焦虑，都环绕了同一个问题：边缘性身分和激进政治身分倒底要以何种方式并存？而这个问题的迫切性，以及其中的各种动力纠葛进退，正来自周遭被各种力量激化了的政治氛围。1950 年代的白色恐怖使得当时的同性恋组织选择了放逐激进政治成份以维护边缘性身分的可敬存在，而在 1960 年代末期，激进的社会运动氛围则使得此刻的同性恋运动开始思考：同性恋权益的争取是否要继续以平和的示威为主，还是也可以和新左革命派一样，拥抱像石墙事件中所采取的暴动（武力）方式？这个在传统和激进策略之间的抉择，后来也进一步演变为同性恋运动与其他左派社会运动之间的互动关系考量。

石墙事件发生之后，酒吧附近墙上出现的抗议涂鸦喊出了另一种力量和自我意识。这些涂鸦模仿激进黑人解放运动的口号「黑人力量！」(Black Power)，把它改写为「同性恋力量！」(Gay Power)、「反串力量！」(Drag Power)，以此描绘出另一种同性恋形象，不再是低调的，隐蔽的，而是强悍的，夸示的，而这些涂鸦所具象的同

性恋气势很快就震动了既有的组织。石墙事件后不到一星期，同年7月4日，历史悠久的 **Mattachine Society** 在聚会中讨论到石墙事件，由于会内自命中产阶级而且有文化品味的同性恋领导者在这件事上采取极为低调的态度，对石墙事件当晚劳动阶级群众的暴动手段不表苟同，使得组织内一群比较年轻、有新左派思想、在激进政治运动上颇有经验的男女同性恋者极为不满，决议在 **Mattachine Society** 之下组成一个所谓「行动委员会」(Action Committee)，自行发出文宣，呼吁大家组织起来抗争(Adam 81)。「行动委员会」在7月9日举办第一次「同性恋力量」(Gay Power)聚会，当有人提出变装皇后和游民对石墙事件所做出的具体贡献时，**Mattachine Society** 在场的主流成员又试图压抑这个声音，不想谈石墙事件中具体的社会边缘人（甚至所有受压迫的人）以及他们的处境，而只想一般的来谈如何在冗长的修法过程中进行法律条文的修改，以提升所有同性恋的处境(Teal 16)。这个在意见和策略上的分歧，暴露出主流同性恋团体的中产阶级眼界以及他们对抗争方式的保守观点，也迫使「行动委员会」开始重新评估和既有主流同性恋团体的关系。

7月16日第二次「同性恋力量」(Gay Power)聚会讨论抗争方式时，差异的意见更加明显。主流派同意警方无理暴力之风不可长，但是强调应该维持和建制之间的友善关系以便推动修法，当与会人士热烈讨论要以何种积极的示威抗议措施来声援石墙事件时，**Mattachine Society** 在场的助理建议只需在公园内烛光守夜抗议，因为——要坚定，但是也要「友好而和蔼」。新左派反越战团体出身的 James Fouratt 强烈的反弹，主张同性恋运动需要开始尝试新的运动策略和群体动员方式：「和蔼个屁！你看，又是那个同性恋刻板形象！……我们一定要激进化……老兄！为自己而自豪吧！如果一定要暴动或动刀枪才可以让他们认识我们的本色，那也没什么，条子



们本来就只听得懂这种语言……所有受压迫的人要团结起来！这个体制就是靠着分化我们来削弱我们……我们一定要和*所有的*新左派合作」(Teal 18-19)。就在这次的聚会中，「行动委员会」决定和 Mattachine 分道扬镳<sup>19</sup>。

为了表达明确的激进意含，新的同性恋集结采用了当时色彩鲜明的新左派语言。于是当那些和 Mattachine 分道扬镳的「行动委员会」成员以及其他来自不同新左派运动背景但是有相同激进理念的同性恋者决定在 7 月 24 日集结聚会时，他们的文宣标题就明白宣告了「同性恋革命」(The Homosexual Revolution)的到来，这份文宣也首度把同性恋运动描绘成广泛的「革命运动」(revolutionary movement)的一部份(Teal 19)，追求的是选择「不受骚扰的生活方式，公开爱我们所爱之人」的权利，「我们拒绝接受异性恋加诸于性的罪恶感」(Teal 20)。一星期后，7 月 31 日同性恋新左派在「另类大学」再度聚会<sup>20</sup>，这两次聚会的结果笼统的形成了一个新的、与比较温和的同性恋爱(homophile)组织分庭抗礼的运动团体，并自我定位为「同性恋青年反叛」(gay youth rebellion)的一部份(Faderman, "The Big Bang" 21)，正式采用「同性恋解放阵线」(Gay Liberation Front, GLF)作为名称以宣告自身的左翼渊源——五零年代寻求脱离法国殖民统治的阿尔及利亚恐怖主义组织，以及越战中由共产党的胡志明所领导的反帝队伍，都选择称呼自己为「国家解放阵线」(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

<sup>19</sup> 后来另外一批人在 Mattachine Society 中又成立了第二个「行动委员会」，采取平和的静坐和占领空间的方式来抗争，但是在年轻一代之中一直没有多少吸引力(Teal 19)。

<sup>20</sup> 「另类大学」是当时进步人士开设的一个夜间学校，没有成绩、学分、或年龄限制，专门提供「别的地方不提供的课程」(Teal 20n)。

(Teal 22)——而「同性恋解放阵线」的名称选择，不但表明这个新的同性恋「组织」是以政治上的左翼激进立场集体出柜，再度结合激进的政治身分和边缘的性身分，同时也预示了这个「阵线」的运作将以上述反殖反帝的激进模式为原型，并与其他激进的左翼运动形成连线。

说「同性恋解放阵线」是个「组织」或许是一种误导，因为相较于 1950 年代阶层关系严谨的左翼「同志」地下组织 *Mattachine*，1960 年代公开宣告性身分的「同性恋解放阵线」很主要的一个特性，就是它没有什么严谨的组织架构，它是一个「运动」(Power ix)。虽然也和 *Mattachine* 的左翼策略一样以细胞组织为主要发展模式，但是「同性恋解放阵线」的细胞组织是平行发展、独立互动的，而且它欢迎所有同性恋加入；事实上，它也没有什么正式的「成员」，只要参加它所举办的各种活动就算是「阵线」的一份子，可以发言，可以参加决议(Teal 84)。在 60 年代美国国家机器被社会动荡冲突逐步削弱的政治氛围中，此刻的「同性恋解放阵线」已经不再需要像麦卡锡年代那样，用高度严谨隐密的组织架构来确保成员和组织的安全，而可以公开的、自在的高谈阔论，甚至主动出击；另外，「阵线」中来自各种异质运动背景的进步份子也在日渐强化的个人主义基础上，选定民主参与模式作为最合乎正义原则的运作方式，以避免任何人长期垄断或主导「阵线」的运作，因此在一切的聚会讨论中都是透过冗长的讨论来寻求达成共识，而不愿意用多数决的投票暴力来任意决定事情：民主讨论虽然「常常费时，但是可以促进团结」(Teal 84)。

「同性恋解放阵线」在这个阶段的出线，带动了两个很明显的发展，而它们都标示出同性恋运动「酷儿化」的趋势。第一个「酷

儿化」的发展就是前面已经提过的新的同性恋自我形象和气势。

「同性恋解放阵线」的具体口号就是：「做你自己，不必害怕」(Be Yourself; Don't Be Afraid)(Teal 94)，这个口号接合的是 1960 年代波涛汹涌的个人主义和社会运动，因此掀起强大的感染力。就同性恋团体而言，「自豪」的具体表现就是在此时开始流行的「出柜」(come out)行动，新一代的同性恋「已经脱去或正在脱去所有残留的同性恋羞愧，他们想要活在日光下」(Teal 35)；有一个「阵线」成员说：「我没把『阵线』当成一群正在出柜的人；我认为他们是一群早已彻底出柜的人，随时可以走上街头加入战斗。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Teal 35-36)。值得注意的是，对此刻的同性恋解放运动而言，出柜不再是向自己或亲近的朋友承认同性恋的身分而已，这个内部的交心现在被转化为公开的承认，而且主要考量不再是「向谁」承认，而是「以什么态度」来承认同性恋身分，其中最重要的内涵就是「拒绝原本黏在同性恋身上的负面社会意义，代之以骄傲和自我肯定」(D'Emilio & Freedman 322)。在街头运动集体呼喊的高亢口号和理直气壮的挑衅态度中，「出柜」首度有了它最具冲撞力的形体。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最新发展的自豪形式，这份属于同性恋自己的骄傲，在某个程度上，正是在一个笼统的左翼连线中，向另外一些受到压迫的异议群体——例如黑人、女人、政治异议人士等等——学习，以及在和后者并肩作战的抗争行动中发展出来的。<sup>21</sup>

---

<sup>21</sup> 史家当然也注意到这种自豪的戏剧性展现，可是其中颇为发人深省的是，自豪、肯定自我、骄傲等等情绪的文化形象及象征常常是带着性别蕴涵的。换句话说，在既有文化脉络内想要展现以上气势，往往就意味着采用阳刚的、男性的符号和表现方式，因此史家观察到，1970 年代当异性恋男人逐渐以中性的、雌雄同体的装扮（如长发、亮色、柔软布料）来表现自我的开明形象时，男女同性恋却转而穿着牛仔布、方格、及皮革等充满阳刚气息的装

出柜的冲力不是只影响到某种单一性质的性身分而已，事实上，左翼「同性恋解放阵线」的出柜气势也使得女同性恋身分在那个时刻展现出另外一种面貌来。新左派进步阵营在某些方面一向缺乏平等进步的性别意识，因而激励了「妇女问题」(The Woman Question)于1967年在新左派大会中的积极出线(Echols 38-43; Faderman, *Odd Girls* 210-12)；但是1968年8月因拒斥新左派的性别盲点而正式分支出来的「妇女解放运动」(Women's Liberation)，在性身分意识上的说法更令人不敢恭维(Echols 210-15; Faderman, *Odd Girls* 212-14)。被进步运动扫过的女同性恋在男同性恋占绝大多数的「同性恋解放阵线」中仍然觉得被忽视，1970年春天「阵线」中的女同性恋开始筹划自己的舞会，一方面联谊，一方面募款，后来有一部份女同性恋便自组「激进女同性恋」(Radicalesbians)，和别的独立女同性恋组织（如「同性恋女人解放」）一起创造新的运动场域(Adam 99; Teal 165-69)。值得注意的是，新左的运动经验促使激进女同性恋在1970年的「全国妇女组织」大会上，以妇运大老贬抑女同性恋姊妹的封号「紫色麻烦」(Lavender Menace)作为抗争焦点，将这个贬抑的名号「酷儿化」为自傲的口号，正面挑战主流妇运，后来甚至引发妇运阵营中的「清同」，激进的女同性恋如前「阵线」成员 Rita Mae Brown 和 Martha Shelley 都被逐出了妇运(Adam 97; Echols 213-15)。除了在性身分上的毫不退缩外，Brown 和 Shelley 也都在「同性恋解放阵线」的运动经验基础上认定女同性恋应该和其他在种族和阶级上被压迫的人民连线结盟。有意思的是，阶级政治上的差异常常被置换为性别政治上的疑虑：当她们这个串连的立场被人批评时，批

---

扮以展现力量(Adam 104)。这样一个分歧发展，在性与性别身分的纠结操作中，以及在性别角色和刻板形象的界定中，都投入了复杂的因素。

评者并没有直接指出这个立场是左翼的，相反的，这个立场被描述为「认同男性」的(Adam 103)。无论如何，女同性恋运动在这个阶段的突飞猛进确实和领导人物所感受的左翼震荡（不管是赞同或保持距离）有关，并且也因为这些进步经验而在气势和激进思想上超越了主流的妇女运动。

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欣赏这种公开的、理直气壮的气势，许多人也对同性恋者新近采取的激进挑衅方式觉得不安。Mattachine 的一个成员就批评「阵线」好像「充满太多罪恶感和自恨自弃，以致于他们必须向别人狂喊：『我是同性恋！你一定要接受我！然后我才可以接受我自己！』」(Teal 60)。然而，对新一代的激进同性恋而言，有自豪而不表现、不宣告，只能低调的对歧视表示不满，那才是不可思议的，这样的行动派运动态度，甚至使得有些「阵线」成员开始思考逼迫尚未表态的同性恋知名人士「现形」(outing)，以进一步激化同性恋运动的气势(Teal 63)。这意味着「自豪」所带动的激进策略，在另一个着力点上已经开始形成出柜和现身的压力，也在运动动力学的层面上为「同性恋解放阵线」的未来运作投下变数。

除了发展出驾驭在左翼气势上的性身分自豪之外，在新左派的统一战线趋势影响之下，对整体压迫所进行的结构性分析也使得同性恋解放运动在这个时刻跨越了身分认同的疆界，和别的社会运动发展出实际的连线联盟来，这是新同性恋运动的第二个「酷儿化」发展。

其实「同性恋解放阵线」自称为「阵线」就宣示了这个组织不是一个排他的单一组织，而是希望维持某种有广泛包容性的连结，好与其他运动组织的成员形成串连，互为支援(Hogan & Hudson

239)<sup>22</sup>。这种连线关系在「同性恋解放阵线」尚未完全成形定名之前就已开始尝试建立。以一个最「刺眼」的例子来说<sup>23</sup>，尚未离开 **Mattachine** 的「行动委员会」计画在 1969 年 7 月 29 日举行「同性恋权力守夜」以抗议警察的骚扰，他们在事前派发宣传文宣时碰到几个黑豹党成员刚好在格林威治村的女子拘留所前示威抗议要求释放被捕的黑人女性。黑豹党成员听见「同性恋力量」(Gay Power!)的口号时，前来加入声援，双方有了一次美好的合作经验。后来在「行动委员会」的讨论中 **Michael Brown** 建议礼尚往来，在黑豹党举行抗议活动时也加入声援，可是这个建议立刻引发母会 **Mattachine** 的谴责；对总部而言，委员会的成员只能介入和同性恋相关的行动：毕竟，天下那么多受压迫的人，**Mattachine Society** 是不可能全面关心所有「人类解放」的(Teal 17)。在这个节点上的意见差异也造成了「行动委员会」和母会之间的隔阂，促使异议份子后来脱离 **Mattachine** 而自立门户，但是敌忾同仇的连线合作却使后来成立的「同性恋解放阵线」维持和黑豹党之间的友好关系。黑豹党最高总指挥 **Huey P. Newton** 也是美国第一位公开支持同性恋—异性恋平等的知名异性恋男性(Teal 153)，他在 1970 年便以公开信表达和同性恋解放的革命同志团结：「一个人应该有自由以他想要的方式使用自己的身体……我们没有理由说同性做不成革命份子……相反的，或许同性恋是最具革命精神的…」(Adam 86; Thorstad 326-27)。这些连结动作与其说是

---

<sup>22</sup> 他们当时奉为圭臬的读物都是左派的经典，其中最主要和情欲解放相关的就是 **Wilhelm Reich** 的《性革命》和 **Herbert Marcuse** 的《爱欲与文明》(Hekma et. al. 2)。

<sup>23</sup> 说这个例子「刺眼」不但是因为这两个团体的结盟跨越了好几条社会轴线：种族的、政治的、性身分的、抗争策略的，同时也是因为这两个团体在当时历史脉络中的激进、为主流社会不齿的形象。

出于像黑豹党这类非同性恋团体的觉悟，倒不如说是新左派的串连理想和整体的社会分析，使得不同的抗争主体得以在一个松散的革命理念之下合作。

「同性恋解放阵线」成立后仍然积极与其他社会运动连线，以展现同性恋在压迫的体制中与其他弱势受压迫者同命，并在美国当时激烈争议的政治社会等等议题上表示激进的立场<sup>24</sup>。1969年8月中，「阵线」成员参加了纽约市反战和反征兵的活动，「阵线」的旗帜首度公开展现，吸引了无数媒体，也上了电视，这可算是「阵线」第一次参与非同性恋的抗议活动，在非同性恋的示威场合展示性身分的出柜(Teal 36)。在串连统战的影响之下，连大型的同性恋组织都展现出和其他激进社会运动组织或行动合流的趋势。1969年8月下旬，第四届「北美同性恋组织会议」(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f Homophile Organizations, NACHO)在堪萨斯召开时就浮现了激进路线，还发表了一篇〈激进宣言〉，展现与所有少数族群（包括黑人、女人、西裔、嬉皮、学生等遭受压迫的人）并肩战斗的决心，在行动和宣示上显示左翼的色彩(Teal 38)。10月15日「阵线」成员参加第一次全国性的越战停战示威，并在文宣上明白宣告：「同性恋者常常感觉自身是与大部分异性恋者相左的，而这是我们社会中一个很遗憾的分歧。因此同性恋解放阵线欢迎这个机会，能和支持停战要求的异性恋者并肩作战，因为数以百万计的女男同性恋者和数以百万计的女男异性恋者一样，有着完全一样的反战立场」(Teal 52)。1970

---

<sup>24</sup> 1972年著名的专栏作家 Jack Anderson 透露美国安全人员长期监控的名单上就有「同性恋解放阵线」，监控的理由是「防止政治暗杀」，这当然是美国在60年代在包括金恩、甘乃迪兄弟等一连串政治暗杀后加强安检的重要理由，但也显示「阵线」被视为危险暴力组织(Thompson 68)。

年第五届「北美同性恋组织会议」在旧金山召开，大会甚至通过正式决议，直接要求美国从越南撤兵，要求授权同性恋罢工日，而且要求跨越国界和历史时空，呼吁纪念二次大战时在纳粹集中营中丧生的同性恋(Adam 86)。在这些决议中，同性恋团体的关切已经远远超越了单纯的、眼前的、画地为限的性身分诉求，而尝试和其他议题连结，寻求和其他社会运动的共通性，在不同的议题诉求上互为奥援。

「同性恋解放阵线」在议题上的多元发展并不只表现为和其他运动团体的平等连线，事实上，它的激进策略和自豪的主体养成也在本身同性恋社群中召唤出更多的主体位置、欲望、及不满。在「阵线」中浮现的妇女运动议题(cf. Echols; Teal 169)、种族差异议题(Teal 194)、女同性恋议题(Teal 170-72)、变性者和反串者议题(Teal 190-95)，都在群体内部渐次形成新的小组织，新的关切，也在「阵线」松散的民主气氛中对旧的组织提出震聋发聩的提醒。在这个时代氛围之下，左派政党或许对同性恋还是采取保留态度，但是个别左派所组成的小组织却没有走老一辈的路线，因此 70 年代初期美国也出现了不少诉求不同主体的左派同性恋组织。例如：「同性恋解放阵线」内部的社会主义革命派组织了「红蝴蝶」(Red Butterfly)；对同性恋所遭受的压迫提出精辟马克思主义分析的英国「同性恋左派集体」(Gay Left Collective)；洛杉矶的「紫色与红色联盟」(Lavender & Red Union)；纽约的「女同性恋与男同性恋社会主义者委员会」(Committee of Lesbian and Gay Male Socialists)；还有「同性恋革命与同性恋火焰」(Gay Revolution and Gay Flames)；「紫色左派」(Lavender Left)(Thorstad 322)；「激进女同性恋」(Radicalesbians)；「街头变装行动革命者」(Street Transvestite Action Revolutionaries)(Hekma et. al. 2)等等。这些组织并非局限在白种中产阶级之内，例如非裔和西裔同



性恋也组成了「第三世界同性恋革命」(Third World Gay Revolution)等组织(Adam 85)。甚至早在 1969 年,非左派的团体,纽约的「同性恋爱行动联盟」(Homophile Action Alliance)也已开始援用左派的词汇来宣告:「我们活在革命的年代中,而这个国家的革命谚语就是——对抗」(Faderman, "The Big Bang" 18)。这些新的细胞组织都为 70 年代的同性恋解放运动注入了多元异质的因素,也使得左翼同性恋的操作方式在各个运动场域中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

「同性恋解放阵线」和新左派运动之间的千丝万缕牵连——表现为成员的多重身分、左翼同性恋小团体的蓬勃发展、以及街头抗议活动的重迭性——当然也会引起关切,许多资深的同性恋运动人士对新的激进同性恋者不满。毕竟,对那些长久以来一直在走比较平和的同性爱(homophile)路线中的人士而言,好不容易才等到了此刻,修法看来有望,法院对同性恋案件也开始有了一点友善的回应,同性恋似乎有机会分享主流社会资源了,可是,就在这一刻却跑出来一堆年轻的同性恋,不但不在这方面继续积极努力,反而蔑视老一辈的努力,一心只想推动更广大的社会革命,要分心去支援别的运动(Teal 74)。面对日渐激进的同性恋运动,倾向主流的人因此提出警告,认为同性恋运动「不但会因为和非同性恋的运动连结而受到阻碍,更会因为各种非暴力或暴力的激进行动、或者因为采取左翼倾向、或者因为和左翼组织结盟,而严重危及自身」(Teal 74)。其实这个忧虑也不是此刻才有,早在 1969 年 5 月的同性恋杂志 *Advocate* 中就已出现了题为〈别再和新左派一起厮混了!〉的文章。反对和左派走得太近的同性恋曾经归纳出他们反对的理由:第一个原因是经济的考量,因为同性恋社群需要稳定的、富裕的社会,「我们倚赖那些有经济实力的中产阶级异性恋者来支持我们的舞台表演、发廊、时装行业、以及其他服务」(Teal 76);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同性恋所诉

求的目标——例如被主流社会接纳——和新左派的激进社会革命目标极端相反；第三个原因则是因为「一般」的同性恋对革命没兴趣；第四个原因是因为新左派在同性恋议题上心口不一(Teal 76)。这些复杂但口径一致的疑惧，使得同性恋运动和新左运动之间的关系，在「同性恋解放阵线」之内一直不定时的引发紧张的状态。

除了运动策略问题之外，身分认同的优先顺序也在组织和个人层次上都形成拉锯。「同性恋解放阵线」刚刚成立就已经开始争议要不要和当时最大的新左派学运团体「民主社会学生联盟」(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SDS)连线，以便在新左派的组织内发展少数族群的议题路线，更加扩大同性恋的战线；毕竟，对很多新近激化的同性恋激进份子而言，做个激进份子就意味着在所有的社会议题上都要有激进意识和行动——只有全方位的激进份子，而不可能维持只做同性恋激进份子。到底是 Left Gay 还是 Gay Leftists，名称的选择就标示了主要身分认同的认定。然而成员们有很多都是早年先在新左派运动中成长，有了好一阵子的运动经验，然后才在同性恋解放运动中浮现他们另一个新的认同身分，对他们而言，这两个身分之间的关系或许并不是份量孰重孰轻的问题，而是在历史经验的时序上有先有后的问题(Teal 35)，但是在运动路线的选择上有争议的时候（例如要不要和黑豹党或新左派连线时），这个时序上的先后却很容易被诠释并僵化为身分认同的忠诚问题，因而为主体造成抉择的困难。

当激化的社会氛围使得个人忠诚与否的选择益形尖锐时，组织内部的分裂局势也就很容易出现了。1969年11月「同性恋解放阵线」内部的分歧已经开始被建构为另起炉灶的必要；有趣的是，出走的成员并没有把前面所说的对左翼路线的疑虑提出来作为理由说

明，而是选择在身分认同和运动成效的轴线上提出异议。从「阵线」出走自立门户的 Jim Owles 和 Marty Robinson 都说是因为「阵线」太过混乱，无组织，缺乏经过一定选举程序而产生的领导阶层，言论高亢而无实质效应，常常和一些不一定尊重同性恋的运动组织连结，而且太过关注广泛的社会革命而没有把全副精力放在和同性恋权益相关的事情上，所以 Owles 和 Robinson 才想到另外成立了「同性恋行动份子联盟」(Gay Activists Alliance, GAA)，以便专心的推动和同性恋权益直接相关的议题(Adam 86; Teal 110)。可是观察者也注意到，真正让许多同性恋者不安的是「阵线」的左翼连结；例如「阵线」中存在着细胞组织中有像「六月二十八」之类的激进左翼革命团体，更具体的因素则是分裂当晚的讨论议题——正是「阵线」是否要支持黑豹党，而投票结果是肯定的，因此 GAA 的出走，事实上绝对和政治立场有关(Teal 89)。可是这两个团体后来还是在许多场合中并肩作战。

GAA 的运动策略被称为「保守的激进主义」(conservative radicalism)，因为它选择在老派同性恋路线和激进派左翼同性恋路线中采取中庸之道(Teal 111)，它主张在现有的建制之内运作，以渐进平和的方式来争取同性恋权益。由于它有传统的严谨阶层组织架构，有比较温和的运动气质，想在现有体制内诉求主流价值以提升同性恋的个人生活品质，因此这个组织后来证明是比较讨好当下大部分饱受歧视的同性恋的口味的。至于激进松散的「同性恋解放阵线」，在成立之时便有各式各样的小组织和各种冲突差异的运动气质，再加上它执行的模式是参与式民主，在纪律和效率上都不如 GAA，时至 1971 年，「阵线」已经几乎虚有其名，史家也说「阵线」(Front)在发展过程中愈来愈像个「门面」(front)。以纽约的「同性恋解放阵线」为例，1970 年夏末，它包含了 19 个行动小组（也就是细胞组

织)、12个意识觉醒小组、周三有专属男性的聚会、周日有专属女性的聚会、3个群居团体、以及1个激进读书小组,除了每个星期天晚上的大聚会之外,要是有特别议题出现,还会临时组成其他团体来进行辩论,但是本身却根本就没有任何宪章或专职工作人员(Teal 136)。以阶层化的思考来看,这样一个「阵线」或许在各种议题纷纷出笼的年代中容易形成力量的分散,但是由于所有这些小团体都是自立运作,在协商中形成联合的「阵线」,因此反而使得「阵线」所发展的自豪气息和串连策略有最大的空间扩散渗透到各种团体和组织中,成为日后抗争运动的新起点。

## 结语

从这个历史的传承来看,90年代出现的酷儿运动引人注目的抗争策略和令人不安的激进立场,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在本文中所提到的前期以左翼为立场的同性恋运动中找到前驱<sup>25</sup>。毕竟,性身分的抗

---

<sup>25</sup> 以最刺激众人想像的「酷儿国族」(Queer Nation)为例,这个1990年在纽约市成立的直接行动组织之所以采用「酷儿」「国族」为组织和个人身分之名,就表明了一种反对同化融入、维持特殊性的立场,也标示了它不甩成规的自豪气魄:最新一代的同性恋者已不再寻求融入主流,相反的,他们肯定自我,充满创意,知道如何操弄媒体,也不怕采取令人侧目的手法。当然,「酷儿」一词在被西方同性恋重新夺回用以定义自我的历史时刻也是多有争议的,1993年旧金山「同性恋自豪大游行」决定采用「酷儿年」为主题,多多少少正式认定了它是同性恋运动的身分代表,也因此立刻广泛引发众多同性恋者投书报端辩论此一举动的意义和影响(cf. Thomas)。这样一个意见上的强烈分歧正反映了运动路线主流化或边缘化之间的歧异,也凸显了性身分纠葛的政治(阶级、族群、性别等等)身分。后来「酷儿国族」据说是因为两个——听来非常熟悉的——原因,很快就在1991年瓦解:第一,这个组织很松散,一切决策都用讨论共识的方式进行,容易产生异议;第二,这个组织维持了左派组织一贯的统战立场,宽广的参与其他抗争议题,也因此政治立场上的意见差异往往在组织内部形成张力,例

争出线总是被许多社会因素穿透折射的，而在激化震荡的政治氛围之内，性身分所建构的「同质性」立刻承受严重的考验，性身分的复杂纠葛也立刻在运动团体内部形成各种波动。事实上，不仅性身分，各种认同政治的运动都曾经或正在面临同样的考验，可是，正如前文所示，这样一个歧异会以什么形式来表现、化解、排挤或根本分裂，还要看当下的社会政治氛围以及运动成员的互动角力来决定；美国同性恋运动酷儿化过程中的历史公案正为我们在这条轴线上的思考呈现了可能的面向。

许多研究「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人都在理论的解说中凸显了酷儿身分认同之抽象流动，酷儿身分也常常被人描绘为游移的、变动的、多重的，因此听来也带着自由自在、活跃变换的惊喜乐趣。但是在历史的过程中同时看到的是，性身分的酷儿化过程事实上常常伴随了——而且也必须面对——暴力压抑的回应；而令人深思的是，这样的暴力压抑往往并非来自同性恋运动所对抗的父权异性恋体制，相反的，它来自「同一」性身分的兄弟姐妹们，它来自掩盖在性身分之下的政治身分（阶级、种族、文化等）的差异和因此而来的压迫。从这个角度来看，（左翼）酷儿身分在高度压力之下却仍然高亢的向着——不是主流的、可敬的、受欢迎的、被欣羨的方向——而是边缘的、被放逐的、最强烈受到压迫的、那不可说的方向欢欣的流动，并且以灵活的策略将酷儿在历史进程中发展出来的各种特质渗透进入各个社会文化领域，这样百折不挠的抗争和运动，恐怕正是（左翼）酷儿运动最可贵的传承。

---

如，当「酷儿国族」加入抗议美国发动波斯湾战争时，便有同志批评这个行动与同志议题没有直接关连。

## Works Cited

- Adam, Barry D. *The Rise of a Gay and Lesbian Movement*. Revised Ed.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95.
- Altman, Dennis. "What Changed in the Seventies?" *Gay Left Collective*, ed. 52-63.
- Beemyn, Brett & Mickey Eliason, eds. *Queer Studies: A Lesbian, Gay, Bisexual, & Transgender Anthology*. New York: New York UP, 1996.
- D'Emilio, John. *Making Trouble: Essays on Gay History, Politics, and the Univers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 D'Emilio, John & Estelle B. Freedman. *Intimate Matters: A History of Sexuality in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8.
- Echols, Alice. *Daring To Be Bad: Radical Feminism in America 1967-1975*.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89.
- Ehrenreich, Barbara, Elizabeth Hess, & Gloria Jacobs. *Re-Making Love: The Feminization of Sex*. New York: Doubleday, 1986.
- Faderman, Lillian. "The Big Bang." *Thompson*, ed. 17-19.
- . *Odd Girls and Twilight Lovers: A History of Lesbian Life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New York: Penguin, 1991.
- Gay Left Collective, ed. *Homosexuality: Power and Politics*. London: Allison & Busby, 1980, 1982.
- Hall, Jacquelyn Dowd. "Open Secrets: Memory, Imagination and the Refashioning of Southern Identity." *American Quarterly* 50.1 (March 1998): 109-124.
- Hekma, Gert, Harry Oosterhuis, & James Steakley. "Leftist Sexual Politics and Homosexuality: A Historical Overview." *Hekma et. al.*, eds. 1-40.

- Hekma, Gert, Harry Oosterhuis, & James Steakley, eds. *Gay Men and the Sexual History of the Political Left*. New York: Harrington Park Press, 1995.
- Hogan, Steve & Lee Hudson. *Completely Queer: The Gay and Lesbian Encyclopedia*. New York: Henry Holt & Co., 1998.
- Horowitz, David. "Queer Revolution: The Last Stage of Radicalism." *The Material Queer: A LesBiGay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Ed. By Donald Morton. Boulder, CO: Westview, 1996. 328-336.
- James, Christopher. "Denying Complexity: The Dismissal and Appropriation of Bisexuality in Queer, Lesbian, and Gay Theory." Beemyn & Eliason, eds. 217-240.
- Katz, Jonathan Ned. "Introduction to the 1995 Edition." Teal. xv-xx.
- Power, Lisa. *No Bath But Plenty of Bubbles: An Oral History of the Gay Liberation Front, 1970-1973*. London: Cassell, 1995.
- Segal, Lynne. *Straight Sex: Rethinking the Politics of Pleasure*. London: Virago, 1994.
- Seidman, Steven. *Embattled Eros: Sexual Politics and Ethics in Contemporary America*.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 . *Romantic Longings: Love in America, 1830-1980*.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 Smith, Cherry. "What Is This Thing Called Queer?" *The Material Queer: A LesBiGay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Ed. By Donald Morton. Boulder, CO: Westview P, 1996. 277-285.
- Teal, Donn. *The Gay Militants: How Gay Liberation Began in America, 1969-1971*. New York: St. Martin's P, 1971, 1995
- Thomas, David J. "The 'Q' Word." Special 25<sup>th</sup> Anniversary Issue: Queer Subjects. *Socialist Review* 25.1 (1995): 69-94.
- Thompson, Mark, ed. *Long Road to Freedom: The Advocate History of The Gay and Lesbian Movement*. New York: St. Martin's P, 1994.

- Thornstad, David. "Homosexuality and the American Left: The Impact of Stonewall." Hekma et. al., eds. 319-350.
- Warner, Michael. "Introduction." *Fear of a Queer Planet: Queer Politics and Social Theory*. Ed. By Michael Warner.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93. vii-xxxi.
- Weeks, Jeffrey. *Sexuality and Its Discontents: Meanings, Myths & Modern Sexualities*. London: Routledge, 1985.